

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八

集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八●

旧 时 黑 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年合肥

封面题签：张恺帆
封底篆刻：郑家琪
特约编辑：邹人煜、庞振月、陈金沙
责任编辑：童本道
封面设计：马世云

旧时黑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211,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0

ISBN7-212-00003-5/K3

统一书号：11102·86 定价：1.80元

前 言

旧社会黑幕重重。本辑着重揭露寄生在旧社会腐朽肌体上的一些毒瘤——匪盗、娼妓、烟毒、赌博以及其他有关黑幕。其目的是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旧社会的丑恶，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

烟赌娼盗是旧社会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那时小街僻巷烟馆林立，历代统治者鼓励毒品的种植贩运，从中牟利。而赌博之风在旧社会更是盛行；赌博种类繁多，嗜赌者常常倾家荡产，沦为盗匪。娼妓是一种极其丑恶的社会现象，但在旧社会却公开存在。许多军阀官僚、流氓恶棍经常麋集妓院，不少青年也被勾引堕入陷阱。娼妓导致性病流行，危害极大。兵连祸结的动乱岁月，匪盗是一种消除不了的社会痼疾，特别是大股匪盗，窜扰城乡，烧杀淫掳，无恶不作，人民备受苦难。以上这些旧社会的黑幕，本辑都有详尽介绍。

帮会是旧中国的产物。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人生活所迫，往往投身于旧式会党，如青帮、红帮、大刀会等。由于他们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影响，思想愚昧，因而他们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原始性和落后性。他们既有反抗旧社会压迫的一面，又有被封建、官僚统治阶级操纵利用的一面。如何处置这批人的问题，是旧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些帮会组织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的性质如何变化，它的活动方式以及有什么帮规帮教，本辑有较多的史料予以阐明。

旧社会还有其他许多黑风黑幕，如贿选、抓丁、特务活动、

军阀丑闻等，本辑也选了一些资料予以揭露。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7年3月

目 录

前 言.....编 者(1)

鸦片在亳县的流行和危害.....张荫庭(1)

国民党“禁烟”真相(三篇).....徐锦文等(6)

华昌街与烟花女.....范家骅、耕汉(14)

旧社会安庆的明娼暗妓.....徐锦文(20)

解放前芜湖的妓院.....朱鼎元(29)

界首妓女及其新生.....戚耀华(33)

老鸨的罪行.....鲍自安口述(38)

张荫庭整理

一则赌局受骗的经过.....张子清(41)

旧社会的斗蟋蟀.....费泽普(45)

股匪“老洋人”洗劫阜阳目睹记.....霍沛林口述(48)

梁义三整理

李老末撕毁“肉票”简记.....黄选德(54)

巢湖土匪始末.....凌厚全口述(56)

蒋伯举 黄庭宣整理

一起抢劫银行金库的大案.....隗启明(61)

武装匪特岳岐山覆灭记.....刘培全(64)

飞贼落网记.....张允贵口述(71)

张书元整理

凤台红枪会及其覆灭·····	陈元良(78)
青帮内幕(五篇)·····	安文生等(83)
大刀会记略(二篇)·····	史慕山等(109)
抗战时期红帮在大别山的活动·····	王孝楚(125)
蒙城反动会道门及其叛乱被歼始末·····	慕占民(128)
旧社会皖中迷信活动记略·····	费泽普(136)
记六安乩坛总汇——慈云宫·····	王孝楚(139)
我知道的算命卜卦和“花子头”·····	倪石岩(149)
旧社会宿县的神汉和巫婆·····	吴芝庭(154)
军阀、政客丑闻三则·····	贾润泉等(164)
安庆旧闻四则·····	南州(167)
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	邓峙一(170)
封建庄园及封建族规(二篇)·····	胡苏明等(174)
“竞选”丑闻(三篇)·····	程景珊等(190)
旧社会诉讼的黑幕(二篇)·····	黄光章等(198)
特务机关内幕及其罪行(二篇)·····	程子华等(205)
旧社会征兵的黑幕(三篇)·····	罗昌民等(215)

附 录

我省部分地区旧习俗史料(三篇)

鸦片在亳县的流行和危害

张荫庭

清末民初，鸦片在亳县流行得相当猖獗，大批毒品的生产和贩运，促成了亳县经济的畸形发展。当时亳县有“七十二条街，四十八条巷”，“四码头，八小市”，呈现着虚假的繁荣。

—

亳县早先很少有巨室大富，可是到了清末民初，由于镇压农民革命，先后有些人发了迹，因而形成了“姜、蒋、刘、李、耿、马、路、汤”八大家族的地主集团。他们占有的土地数量急骤上升，有的达到三、四百顷。因此世风日下，生活上愈益骄奢淫逸。居则高楼广厦，食则珍饈美味，衣则绸、缎、呢、绒；出外有安舆轻车，居内有三房五妾。饱食之余，除去寻花问柳，赌酒博奕而外，尤其醉心于昼夜颠倒，吞云吐雾——吸鸦片烟。

当时亳县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吸食鸦片烟。许多富绅之家自小就让子女陪灯看盏，让他们染上嗜好。渐渐地，这种嗜好从地主阶层波及到工商业者。他们借此作为交际品，客堂内常年备置烟灯，谈生意，做买卖，既能消磨时光，又能款语细商。又因为当时的烟价很低，每两鸦片只需银元二块，有铜钱百文就能买一锅烟，以至舆夫、妓女，将劳动所得，卖淫所获，也甘愿拿去买这毒品，以寻求精神刺激。那时洪济桥一个轿铺，就有十来盏烟灯。其他阶层的群众，染此嗜好的，可想而知。

二

最初，亳县种植鸦片的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后来逐年增加，尤其张集、颜集、余集一带，竟占到当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育烟的农户达百分之七十之多。因出产丰富，且烟土质量较好，一时外客云集。

当时有些人吸鸦片烟的口味很高，认为亳县的烟土不如北方的烟土好。姜桂题派在涡北给他守户看门的三营毅军，就额外干起武装贩运烟土的勾当。他们由热河进关，从粤汉路到达开封，再用马轿车把烟土装运回亳。经营这些贩来的烟土的，是程开山、邢佩堂、张金标和姜家“瑞成”钱庄的经理李香南等人。永城、夏邑、蒙城，以及沈邱、太和、界首，直至漯河、周家口也都有专门烟客，来亳贩运。

白布街一家杂货铺的掌柜，姓高，人都叫他高胖，因和李香南有点亲戚关系，巴结上了姜呈五（姜桂题的义子），于是杂货铺也不干了，专门替“瑞成”做烟土生意。他在毅军里挂个名义，经常来往于亳县、漯河之间。身后跟着成群挂盒子炮的卫兵，威风凛凛，无人敢来过问，打开了漯河这个码头。

大量贩毒的，除姜家而外，以蒋家最为著名。蒋逊之是蒋家的代表人物。他是亳县民团、商团的团长，掌握着地方武装，同时兼商务会长、田利局长……。他不但大量种植鸦片，而且还在家里制造红丸、白丸，倾销河南各地。这种丸子形似豌豆大小，里面除了鸦片，还含有大量葡萄糖，有很强的粘性，可以用吸食大烟的方法食用。大烟还要通过煮烧等加工手续，红、白丸使用起来比大烟要简便得多。蒋逊之凭借势力还包办红、白丸的税收，每年获利平均都有二、三十万银元。

军阀政府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查禁毒品，反而还依靠鸦片收入，充实军饷。他们表面上每年都派员“查禁”，实际上却是给一群腐朽官僚增添一条鱼肉乡民的进财之道。那些

下来“查禁”的委员都是花钱运动得来的，他们“查禁”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借机诈财而已。“强龙不压地头蛇”，来亳后他们要先与蒋逊之谈妥分肥条件，然后才能下乡查苗课税。哪里种得多，哪里种得少，蒋是非常清楚的。只要鸦片种植者多花钱贿赂蒋逊之，蒋就可以给予方便。自然也有的查苗委员，企图越过蒋的门坎，独吞或多占查苗所获之利，但没有不碰壁的。有一年，一个委员来查苗，没有理睬蒋逊之，当他到了城父寨地区（蒋的家族聚居之地），竟被人从轿里拉出来，架上粪筐抬了出去。还有一次亳县县长刘琢之，与蒋逊之分肥后尚不知足，自己坐着轿，再去复查，只要看见烟花，就住轿查苗，任意登记亩数。因为当时种烟的多，有时不注意，麦田里也撒下几颗烟种子，长了出来，农民不舍得拔除，刘琢之看见，就强迫登记，然后每亩征收烟捐，因此农民恨之入骨，自动组织起来，拦在大路口，等刘琢之的轿一到，就用萝卜、砖头砸刘琢之的轿子。事后一轰而散，刘琢之抓不着人，干气没有办法。刘的后任乐毅红、牛子英、萧伯年等都是一路货色。当时人们编了一首歌“吃马肉（指保安团长马敬臣），喝牛汤（指县长牛子英），受了寒（指五区区长韩丽生），割块姜（指姜北辰），临走喝碗羊肉汤（指区长杨希让），熊也不算（指县长熊公烈）”，公开宣唱。

旧社会的亳县，种植和贩运毒品较之别的地方保险，因此各地烟土贩子，趋之若鹜，亳县也就成为皖北各地的烟土集散地。

三

亳县城里除了几家烟店常年经营烟土以外，在白布街，老砖街，南、爬二巷等处，每当麦收以后，便摆满了烟土桌。乡区各集市，逢集也是烟土桌林立。桌面上除去白花花的洋钱、铜子而外，全都是黑色的土块，紫红色的烟花。桌前都挤满了卖烟土的人，挑、烧、检、验，满街上都飘荡着烟土的香味，场面之大，骇人听闻。收鲜季节自四月直至八月节。街旁的烟土桌收歇了，

铺面里则更加忙了起来。各地烟土商贩，逐渐集中，于是五方杂处，百货云集，茶房、酒肆、剧场、妓院，到处笙歌嘹亮。各地到亳县来跑码头的“夜度娘”，简直成群结队，在灯红酒绿中，赶场卖笑。

大块烟土，除去豪门望族、富商大贾成件的买回去，自己加工煮膏食用而外，一般上瘾的消费者是无力购买的。因此零星烟馆逐渐发展起来。他们都是一家一户经营，每条街都有好几家。最初他们出售煮成的烟膏（很象现在治咳用的梨膏），吸食者买回去，用一个铜质带把的小勺，放在烟灯上熬。后来，这种烟膏逐渐淘汰，而代之以浓缩的烟棒。烟棒用虎皮革叶包裹着，外面再包上一层纸，大小不一，价目有高有低，携带食用，较为便利。但是很多吸毒者懒怠成性，甚至连烧烟都嫌费事，于是海洛英又应运而生了。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亳县也大量出售海洛英。北门到南门的大街，有很多日本人的商店，家家都卖“老海”。因此吸毒者越来越多。据统计，当时成瘾破产、流浪街头的，仅城关一地，就有一千二百余人；学会制造海洛英的技术并以此为业者，有五百余家；南京巷总共只有四十八户人家，就有四十六人制贩毒品。

据说大毒品犯苏锡九，在河上买了一只大船，专门在船上制造老海，以免被人发觉。他到处贩运毒品，为了避免被人查获，甚至雇用很多妇女，把毒品用阴茎套装起来，塞在妇女的阴道内外运。

四

最初鸦片一两只要银元二元，不久就涨到八元一两，后来涨到二十二元一两。由于鸦片价格昂贵，那些有财产的，眼看着坐吃山空；那些没有什么财产的，则典房卖地，继而卖子卖女，甚至连父母也被卖掉，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大地主姜、蒋、刘、李等家的子弟都是离不开“老海”、鸦片的“瘾君子”，尽

管家产丰厚，吸毒吸到后来也只是至多剩下百把几十顷地，有的连祠堂也扒卖了。有个叫吴坤的，毒瘾难戒，为过瘾，先卖子女，后卖老婆，终于家破人亡，每日倒街卧巷。刘老七的儿子，把家产卖尽当光以后，竟把他母亲卖给人家做填房。许多嗜毒的男女，满街上讨钱讨饭，穿得衣不蔽体，瘦得皮包骨头，终日穿梭在街上找熟人要钱。

民国初年，城里经常有染上鸦片烟瘾的流氓无赖，三三五五，聚集成帮，进行明火抢劫。后来各街商号，集资在各街头建立厦门、栅栏，入夜厦门紧闭，这街到那街，都不能通行。此后，虽然明火抢劫事件减少，然而绑架肉票，还是照常。有个叫杨小山的船行掌柜，大白天走在三圣庙河坡里，被两个满面烟色的人，用短枪在身后一戳，说：“对不起，杨掌柜跟我们走一趟。”就这样被人架走，花了不少钱，才平安了结。天棚街一个京剧班老板，名叫贾月樵，头几天被人抢劫，后来在街上看见当地一个烟鬼石字，穿的皮袄与自己被抢的那件一样，就说了一句：“我前天被抢的那件，就跟这样。”不料，当夜就有人到他家。一进门就喊：“贾老板在家吗？”贾月樵闻声迎了出来，刚到大门，砰的一声枪响，贾月樵便倒在血泊之中。

到了日寇陷城的初期，因吸毒无钱铤而走险者所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他们经常在人家门上贴“门神”（诈财恐吓信），信上写明要多少钱，限期几天，送到某地，否则如何如何。如果事主真的置之不理，过期不是被暗杀，就是儿女被绑架。

解放后，党和政府决心彻底铲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一毒害，明令禁止种植鸦片。1952年8月底，开展了大张旗鼓的肃毒运动。这次肃毒运动虽然取得很大成绩，却并没有彻底铲除毒根。1956年，据调查散在农村的毒品，仍有一千斤左右，因此于1958年又一次开展肃毒运动。经过多年的深入工作，毒品之害终于彻底肃清。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想象的。

（亳县政协供稿）

国民党“禁烟”真相(三篇)

陈调元在安庆“禁烟”侧记

徐锦文

1927年至1929年，陈调元任安徽省主席期间，曾公布过一个“禁烟条例”，其措辞相当激烈。大意说：鸦片烟流毒全国，为害甚深。为国富民强计，应对鸦片加强管理，限制进口数量，减少吸烟人数，逐步消灭烟害。为此，由政府设立“禁烟局”，烟土一律官运官卖。经营土膏的行店，须向政府请领特种土膏行店执照，凭照营业。如有私贩、私运、私售烟土者，一经查获，轻则补税罚款，重则私土没收，人受处理。对红丸、白面、吗啡、海洛英之类剧毒品，则坚决禁贩禁吸，如有违禁者，依军法从事。这是多么堂皇！其实，它恰恰是祸国殃民的一块遮羞布，贪污舞弊的挡箭牌。

“禁烟局”设在安庆市西门外柴家巷口(即程良路)，时人称禁烟局为“进烟局”，真是一矢中的。这是陈调元搜刮安徽民脂民膏的得力机构。

随着“禁烟局”的设立，景记土膏行与特业公会也应运而生。当时安庆市“土膏店”约有六、七家，“禁烟局”借口各家分散，不好控制，必须有一家土膏行统一担负代售业务。于是陈调元就物色了韩景琦，发照给他开设独一无二的“景记土膏行”，附设在韩独资开的万顺粮食棉花行内，由韩的心腹何士顺管理帐目。

同时，“禁烟局”又叫各家“土膏店”成立同业性的“特业

公会”，由韩景琦担任会长。为了提高韩的身价，便于在各机关往来，又聘请韩任“禁烟局”顾问、省政府咨议（都是挂名的虚衔），这样一来，韩顿时平步青云，身价百倍。各“土膏行”老板对他是言听计从。韩对外更加交往频繁，他不仅与“禁烟局”、“军警稽查处”常来常往，省政府也时进时出，当时赫赫有名的军警侦缉队队长谢介孚，常在韩的家中或行中吃饭谈心，陈调元得宠的秘书“陈铁头”与韩也来往密切。这些人与韩的往来，当然不仅仅是臭味相投，而是为了互相利用。

首先，“禁烟局”的公务人员，特别是谢介孚手下的军、警人员，也都搞鸦片烟投机，他们每次夹带的私土，总是交给“景记土膏行”代售。当时，稽查处还演了一出焚烟的闹剧，他们煞有介事地当众焚烟，其实，焚毁的“烟土”只不过是面粉和掺进红糖的“牛皮料子”同极少量烟土做成的假货，真正的烟土早交给“景记土膏行”以客货卖给各“土膏店”了。

这些秘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局外人即使知道，也不敢吐漏风声，否则就有杀身之祸。笔者曾在韩景琦的行中当过学徒，当时知道的情况也是微乎其微。

韩景琦经营的“景记土膏行”，表面看整进整出，可是绝大部分是在为权要们销赃。靠着权要们的支持，韩景琦自然也就左右逢源发了大财。

以我短短数年间的耳闻目见，烟土流毒，真是触目惊心，一言难尽。这说明国民党腐败政府是以“禁烟”为名，从中假公济私发横财，包庇舞弊捞一把，从而使鸦片烟流毒蔓延社会各个角落。

（原载《安庆文史资料》第七辑）

阜阳解放前的“禁烟”

李思敏 傅达昌

关于旧社会鸦片烟毒害人民的情况，不仅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就连年老的人也逐渐地淡忘了。现想通过阜阳地方“禁烟”这件事，使年轻的读者更多地知道一些旧社会的黑暗。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禁烟”，是借禁抽税，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国民党阜阳县警察局第二科开设“特费处”，专门稽收鸦片税。如种鸦片，要抽烟苗捐；贩运鸦片，要收运烟捐；卖鸦片，要抽烟税；开鸦片馆，要收开业税、营业税和烟灯税；抽鸦片烟，要收烟民捐。此外还有罚款、没收、充公等名目。

由于征税太重，再加上官府和豪绅的层层盘剥，农民种鸦片烟实在不划算，但不愿种又不行，因为农民不种烟，就卡断了官府和豪绅的“生财之道”。所以，县政府就曾张贴布告，强迫种植鸦片，不种烟的还要罚款。在“寓禁于征”的幌子下，种烟面积不断扩大，据1944年和1945年的统计，仅阜阳县（包括现阜南县全部，利辛县一部分）就种植鸦片一百二十七万亩，占当时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九。

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喊“禁烟”，并规定6月1日为“禁烟日”。1940年阜阳警备司令部也曾枪毙烟毒犯李廉若（外号“土地爷”，是阜阳的大地主），烧了一些烟土、烟具，抓走五洲大药房经理储铸九。但抓人是为了要钱，储一次就给警备司令部的×科长送去五百块银元。当储花了近万元时，人放回来了，烟也不禁了。据知道内情的说，当时查获的鸦片，都放在警备司令部特务队（程家祠堂内），后来又送到“官膏店”内出售；司令部的参谋长从中得利，买了一百多亩地。为什么又枪毙李廉若呢？因李被抓后，到处托人，于是，有说李给司令部送×万银元的，有的则

传说李是×司令的亲戚，众说纷纭，满城风雨，弄得国民党大员骑虎难下，不得不把李枪毙。

国民党如真的禁烟，岂不是自断财路？后来干脆实行“鸦片专卖”，开设“官膏店”，无论生坯、熟膏、批发、零售，一律由政府独家经营。“官膏店”还附设有土膏行，仅阜阳城内就有“鼎新”、“兴盛”、“协和”等五个土膏行。土膏行不但贩卖鸦片，还制造毒品（海洛英，又称老海）。他们是武装运毒的烟匪，公开贩运烟土的集团。城内颜××在他的土膏行下面设立四个分销处。为了推销毒品，又网罗一批地痞流氓（人称“四大金刚”、“五虎将”），充当打手。象这样专门制卖毒品的有51个集团，三百五十一人，其中有妇女二十一人；此外，还有单帮贩卖毒品的一百五十八人，其中有女的二十五人。烟毒最盛行时，据统计在阜阳城一个月贩卖鸦片烟土膏四千六百二十六两，海洛英七千八百七十二两。农村中贩卖和制造毒品的还没有统计在内。然而，国民党的政府还说：这也是为了禁烟。第一，烟民吸烟只能向“官膏店”买；第二，买烟须凭“吸烟证”；第三，“吸烟证”上规定限期戒掉，逾期不予供应。到人人戒掉，鸦片不是就禁绝了吗？实际上，这纯属欺人之谈，其结果只能越禁越盛。解放前夕，阜阳城内共有鸦片烟馆二百一十一家，吸毒成瘾的有三千七百八十九人。当时曾有烟馆多于粮店的说法。

阜阳种鸦片的多，吸毒的也多，流毒很深，以致许多良善人家，由于吸食毒品，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男的沦为盗匪，女的沦为娼妓，有的甚至被迫全家自杀。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因吸毒荡产的在城内有七户。如在古楼旁边开卤菜店的陈××，有平房十六间，楼房五间，一万多元的流动资金，因吸食毒品，把资金花尽，先卖了房屋，最后老婆和他离了婚，穷途末路流浪街头。又如解放前开三处丝铺，雇用二十多名工人的王××，是城内有名的资本家，吸毒不到五年，生意全部垮台，弄得衣食无着。象这样的事例很多，在城内男的因吸毒沦为小偷

的有五十八人，女的因吸毒沦为娼妓的有二十三人。这就是国民党“禁烟”的“德政”。

真正的禁烟是在建国以后。根据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国务院制定了《禁烟禁毒的通令》。阜阳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2月24日布告全县禁烟，8月17日县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禁毒决议，成立了肃毒办公室，下设宣传、外勤、秘书三个股，抽调三十多名干部，负责进行肃毒教育工作；10月在全县开展了肃毒运动。全县人民纷纷检举烟毒犯，控诉烟毒的危害。县政府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九百六十人，组成一百二十个规劝小组，动员自己亲友家属交出毒品、毒具。在党的政策感召和群众的压力下，毒犯纷纷投案自首，交出了毒品、毒具。县政府在三府街（原体育场）召开全城群众大会，当众焚烧毒品、毒具。经过运动，二千四百多吸毒成瘾的人戒除了恶习，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六十多户人家过去妻离子散，后来又重新建立了幸福的家庭。群众反映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在短短的几年间，将一百多年来的烟毒扫除净尽。

（原载《阜阳史话》第四辑）

临淮禁烟的失败

穆世均

临淮关是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它北靠淮河，南有京沪铁路，水陆交通十分方便，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可是在解放前，官匪勾结，帮会猖獗，广设烟馆，贩毒吸毒，把一座好端端的古城闹得乌烟瘴气。

抗日战争前，鸦片已输入临淮。1932年时临淮关就有五、六家鸦片馆，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到十几家大烟馆。那时的政府虽也